

反 杜 林 论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
的变革)

恩格斯原著

人民出版社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论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

吴 黎 平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联 合 起 来！

目 录

三版序文	1
一	1
二	4
三	12
引论	13
一 概论	13
二 杜林先生作了何种诺言	28
第一编 哲学	34
三 分类。先验论	34
四 世界模式论	41
五 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47
六 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59
七 自然哲学。有机界	69
八 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80
九 道德和法。永恒的真理	88
十 道德和法。平等	101
十一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115
十二 辩证法。量和质	127
十三 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138
十四 结论	153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156
一 对象和方法	156
二 暴力论	169
三 暴力论 (续)	177
四 暴力论 (续完)	186
五 价值论	198
六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211
七 资本和剩余价值	217
八 资本和剩余价值 (续)	227
九 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238
十 《批判史》论述	245
第三编 社会主义	277
一 历史	277
二 理论	291
三 生产	312
四 分配	327
五 国家, 家庭, 教育	343
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导言	358
校译后记	387

三 版 序 文

—

这部著作，绝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成果。恰正相反。

当三年前，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进家，突然向当世挑战之时，我在德国的友人，向我作坚持的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上批判地评论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要排除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发生派别分裂和混乱的新的缘由，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们能比我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而且，此外还明白可以看到，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出版物，热诚地接受了这个新改宗者，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使人有根据设想，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先生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相信了杜林先生的学说。还有些人竟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不得不采取决然的态度。

话虽如此，但是只在一年之后，我才能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而且它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

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被装成为某种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所以就必须联系这个哲学体系去考察这一理论，这样就必须分析这个哲学体系本身，因之也就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他纵谈天下所有形形色色事物、甚至比这还更广泛的领域中。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文章，从1877年年初起陆续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人民国家》的继承者上，现在，在这里就汇集为这部著作。

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与这一对象的科学内容即与杜林先生著作的科学内容极端不相称的详尽程度。但是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详尽程度的缘由，一方面，它使我在书里所牵涉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有可能以正面的形式发挥我对于所争论的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普遍的、科学的和实际的兴趣。这在每一章里都是有的，此书虽并不抱定目标，要以另一个体系去与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应当希望读者不会略过我所提出的各方面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指出在这方面我的工作不是完全无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意志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意志，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似的生长起来。最不行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整个的“体系”。正好似在现代的国家里，假定着每一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问题有资格作出判断一样，同时好似在政治经济学中，假定着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购买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类似的假定。科学的自由被认为是人们可以撰写一切他们所不曾研究过的东西，而这被当作是唯一严格的

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意志到处风行，并以其高超的吹牛的喧声淹没一切。诗歌上、哲学上、政治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历史科学上种种高超的牛皮，从研究室里和从讲台上所吹出来的牛皮；到处吹出来的牛皮；这种牛皮抱着想要出人头地、想要成为深刻思想的野心，而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牛皮相区别；这种牛皮是德意志知识工业最标本、最大量的产品，它以“廉而劣”为格言，——完全和其他德意志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没有和其他产品一起陈列于菲拉得尔菲亚^①的展览会上。甚至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特别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吹牛，产生以“科学”自傲的种种角色，对于这种科学，他们“实在是从来没有学过”。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归依于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这种幼稚病是和这一过程不能分离的，可是对于这种幼稚病，我们的工人以自己非常健康的本性，无疑地将会予以克服。

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出来说话的领域里，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样的场合里，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正确的、无可辩难的事实去与我的论敌的谬误的或歪曲的断言相对抗。在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几个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场合里，那里说到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于邻近的领域——在那里，象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他这个专门家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我希望对于那些表达法上稍有不确切的笨拙之处能够得到

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城，也有译作“费城”的。——译者注

原谅，正好似各门的专门家间在这样的场合上通常互相原谅一样。

当我写完这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杜林先生所草拟的、出版社关于杜林先生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出版的广告。我完全承认自己对于物理和化学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们的杜林先生我是知道得很充分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的著作，我已可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内所确立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与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和他以前所发现的、被批判于本书中的政治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并驾齐驱；而杜林先生所设计制造的“低温计”，或测量极低温度的仪器，不是用来测量温度的高低，而唯一的只能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无知的高傲。

1878年6月11日，伦敦。

二

本书需要发行新版，这对我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书不但在1877到1878年间分篇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千千万万读者，而且还印成巨量的单行本。我在几年前所写的关于杜林先生的东西，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上面，我首先要归因于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反社会党人法令颁布之后，本书和几乎所有当时尚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被禁于德意志帝国。谁要是还没有执迷于神圣同盟诸国的传统的官僚主义偏见，谁就可以清楚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二倍、三倍的畅销，它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

了禁令，但却不能贯彻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照顾，我的小著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来恰当地修订本文，而大部分不能不简单地听其照旧版翻印。

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评论的杜林先生的“体系”，包括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对抗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评转变为积极的了，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多少连贯的阐述——而这一个阐述是包含了十分广泛的知识领域的。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始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期，及至《资本论》出世，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其影响于愈益广大的各界。现在它已远超出欧洲范围，在所有一方面有无产者，他方面有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那些国度里，它都引起了注意并获得了拥护。这样看来，似乎有着这样的读者大众，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为了这上面所发挥的积极内容而容忍了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丧失目标的、对于杜林主张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树立和阐发的，而只有微小的部分是由我做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经他的认可是不能出版的，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我在交去付印之前，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政治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由马克思写的，我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才不得不很可惋惜地把它稍加缩短。这种在专业上的互相帮助，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样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虽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来作彻底的

修订。我负着编印马克思所遗手稿的责任，这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远更重要的。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许我对本文作任何变动。此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以为论敌既然不能修改什么，那我对论敌也负有责任不应作任何的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可是关于杜林先生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对于他的理论的清算是已经结束了。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可耻的、不公正的方法对待他，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守的一切规则。真的，这个大学为了这点已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竟然做到剥夺杜林先生教学自由的地步，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凡银格尔^①强加于这大学，那么它是无权来表示惊讶的。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完全是论述我所主张的世界观的核心，所以如果我试图写得更通俗些，增补得比较完整些，那么，我的论敌是不能有所责难的。此外，在这上面还有外部的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重编成单独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的原文之后，一个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小册子在数月内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在所有这些版本里，只有上述的一章被增补了，所以，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么这将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① E. Schwenninger(1850—1924)，德国的医师。1881年起任俾斯麦的侍医。1884年被俾斯麦任命为柏林大学医学院教授。——译者注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在两点上面。第一，是关于人类原始史。只在1877年，摩尔根方才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可是由于在此之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出版）一书中运用在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是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现在许多地方尽可以解说得比较清楚些，比较肯定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来对这部分加以修订，所以在这里我理应对自己作一个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与历史观的唯一的。可是对于辩证法的同时是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须要有数学的与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但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之，当我摒弃商业、移居伦敦时^①，我获得了进行此种研究所必需的时间，并且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经历一个“脱毛”——象李比格(Liebig)所说的——的过程，在八年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正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我不得不从事于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所以这上面如果我常常不能选出确当的技术上的表达法，如果我一般地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么这是极其自然的。可是他方面，觉得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的那种意识，也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与当时所共知的事实不符的真正的错误，或者对于当时公认的理论的不正

① 恩格斯在1870年秋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译者注

确的叙述。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尚未被人承认的伟大数学家，用书面向马克思诉说我放肆地触犯了 $\sqrt{-1}$ 的名誉。

不言而喻，在总结我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学习之时，我是想在细节上也确证那种对于我自己一般地已不引起任何怀疑的真理，就是：自然界中，在不可胜计的、变化的错综复杂情况内，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发生着作用，正好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们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无所不包地，可是带着神秘形式地由黑格尔阐发出来，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以其全部的单纯性与普遍性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不用说，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里面包含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包藏多少有用的胚胎^①——是不能满足我们的。如在本书内所比较详细地阐明了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形式之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就是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有任何前后的连续性，只承认相互间的并存性。这样的观点，一方面是依据黑格尔体系本身而来的，这体系把历史的前进发展，

① 照卡尔·福格特(Karl Vogt)的样子，和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当然比较估计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在旧自然哲学中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也不比在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内所包含的为多，至于在它里面还包含着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这点自从进化论传布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例如，赫克尔(Haeckel)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脱莱维拉奴斯(Treviranus)及奥铿(Oken)的功绩。奥铿在“原浆说”(Urschleim)及“原胞说”(Urbläschen)中提出作为生物的公准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为原形体和细胞。如特别就黑格尔言之，则他在许多方面是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家的，他们举出某一种什么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来解释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如果这些还不适用，那么就举出某种人所不知的质体：光素、热素、电素等等来解释，他们以为这样就把上述现象都说明了。这种臆想出来的东西，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对

单单归之于“精神”——他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所以在这上面，黑格尔远落于康德之后，康德已经以自己的星云说，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见解，同时，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这点的发现，指出了太阳系不可避免的毁灭。最后，在我说来，事情不能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注入于自然界中，而是在于在自然界中找出它们，从自然界里阐发它们。

可是要有系统地在每个领域中去完成这点，那是一个巨大的工作。不仅所要研究的范围几乎是无限广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正经历着这样巨大的变革过程，使得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闲时间来从事于此的人，也难能追踪不失。可是自从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责任占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在自然科学上的工作。目前我还不得限于本书所作的说明，等将来有机会再让我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出来，或许和马克思所遗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

可是，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的著作大部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的发现予以系统化

的玩弄力的那种把戏还嘻皮笑脸地出现着，例如1869年还出现在黑尔姆霍兹在英斯布鲁克(Innsbruck)的演说中(黑尔姆霍兹：《通俗演讲集》，第2卷，第190页，1871年，德文版)。和十八世纪法国人所传下来的对牛顿的神化相反(英国使牛顿满载荣誉与财富)，黑格尔却指出开普勒(德意志令其饥饿而死)是近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而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节及《补遗》中(《黑格尔文集》，德文版，1842年，第7卷，第98、113—115页)，以几个简单公式所证明的东西，却重新出现于吉尔霍夫(Gustav Kirchhoff)的书上(见吉尔霍夫：《数学的物理学讲义》，德文第2版，莱比锡，1877年，第10页)，而被作为最新数理力学的成果，可是实质上他还是采取了黑格尔所首先阐发的那个同样简单的数学形式。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关系，是好象和乌托邦主义者对于近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的。(恩格斯注)

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样的革命应当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不变的对立，划然的不能超越的分界都日益消失了。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被液化以来，自从物体可以变成一种不能分别是液体或是气体的那种状态以来，聚集状态丧失了它们以前的绝对性质之最后残余。根据气体动力学说，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率的自乘，在同温时与分子的重量的成反比例，这样热直接被列入于本身直接可以被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之中，如果，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定律，在十年以前还只被人理解为能量守恒定律，看作是运动不生不灭的简单表现，就是说，只从数量方面去理解，那么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认识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认识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于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被消除了。当运动的数量（所谓能）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相反转化之时，它仍是不变的——这点现在已经不必当作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成为今后对于转化过程本身——这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的认识，综合着全部对于自然的认识——进行内容更加丰富的研究的既得基础。自从按进化论的精神来从事研究生物学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也一一消失了。几乎不能分类的中间环节日增其数；更仔细的研究使得某些有机体从一类转归为另一类，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种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的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物，如果消息证实的话，还有四足的鸟。如果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发现的结果，微耳和不得不把单个动物的统一体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与其说是科学的、辩证法的，毋宁说是进

步的①，——那么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似的白血球之发现，使得关于动物的（因之也是人的）个体的概念也变得远更复杂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认为不可调和的、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这种强制规定的、固定不动的分界线与分类标志，使近代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对于自然界的辩证理解的中心点是在于承认这一真理，即上述这些对立与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有相对的意义，而相反地，想象中的它们的固定性与绝对有效性，则只不过是我们的反思(Reflexion)注入于自然界之中的。人们可以为积累的自然科学事实材料所迫，不得不到达上述辩证的理解，可是如果有了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自然科学事实的辩证性质，那就可以更容易地到达上述这种理解。无论如何自然科学已经进步到如此程度，使之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那些把它的经验综合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的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同样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是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么，它就能使自己更容易经历这种过程。只有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自然科学，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在它之外、在它之上的自然哲学；他方面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所传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1885年9月23日，伦敦。

① 暗指微耳和曾参加自由主义的“进步”党。——编者注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不重要的文字上的修改以外，都是翻印前一版的。只在一章——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象第二版序文所已经说到的，这一章所有实质的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在预定作为杂志文章的初稿上，我曾不能不大大地删节了马克思的手稿，而在所删掉的部分里，恰恰是马克思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史的见解的叙述超越了对于杜林先生主张的批判，而正是这一部分手稿，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最大的持久的兴趣。我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于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恢复马克思的文字，在这里他指明了如配蒂、诺尔斯、洛克、休谟等那样一些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过程上所应占的地位。我认为更加必要的是恢复马克思对于撰内的《经济表》所作的说明，这个表仍然是所有近代经济学所不能解答的司芬克斯^①之谜。相反的，完全关于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我在整个联系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予以删去。

最后，我可以表示十分的欣慰，因为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于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是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度内。

恩 格 斯

1894年5月23日，伦敦。

^① 司芬克斯，乃埃及著名的人首兽身的怪神之像。在古希腊神话中，曾说司芬克斯向过路人提出难猜之谜，如猜不出，就把他吃掉。——译者注